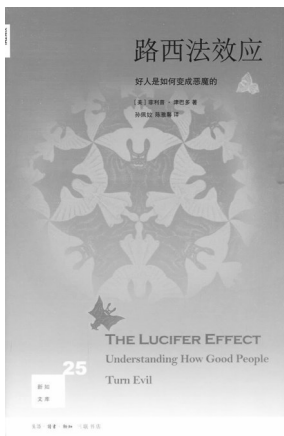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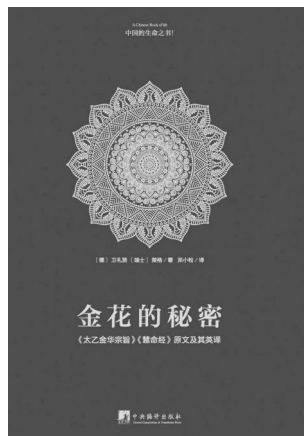




「意」亚历山德罗·马尔佐·马尼奥著
现代出版之父的传奇一生
《书籍是怎样炼成的》
上海三联书店 王铭熠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孙佩娟 陈雅馨译
「美」菲利普·津巴多著
《路西法效应》



「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德」卫礼贤著
《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
中央编译出版社 邓小松译

删言快语

荣格的谜题

□ 删乐昊

看过电影《危险方法》的人，一定会对电影叙事结构中那个强烈的三角留下印象，在这段三角关系中，分处三极的是现代心理学上不可绕过的三个人：弗洛伊德、荣格、萨宾娜。

作为精神分析领域的后起之秀，荣格一度奉弗洛伊德为导师，两人惺惺相惜又彼此启发。萨宾娜是荣格的女病人，美艳又聪慧，在治疗中，她成为荣格的情人，两人展开了一段深刻的恋情。正是她，参与并启发了荣格的词语潜意识研究，而他们之间激越的情欲，仿佛也成了疗愈的一部分。可惜荣格早有家室，他迎娶的富家女是他能从容展开实验的经济保障，这一点令家累甚重的弗洛伊德羡慕不已。

荣格不愿离婚，因此也就不肯承认他与萨宾娜的不伦之恋，反诬一切都是萨宾娜臆想狂发作，萨宾娜失望至极，黯然离去。与此同时，荣格在学术上也与弗洛伊德渐行渐远，他反对弗洛伊德把一切心理问题都归为性本能，亦反感弗洛伊德多味过重的父式权威，最终在学术上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而萨宾娜却转而成了弗洛伊德的病人，这位极度敏感又洞察人性的女患者，先后启发了这两位心理领域的巨擘，同时她也受到他们指点，在治疗的同时研习心理学，进而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

与弗洛伊德决裂之后，荣格的事业走入了死胡同，朋友和同事都背弃了他，他的学说遭到严厉批评，他个人精神方面也出现了问题。他焦虑、幻觉的基因由来已久，荣格的家族曾数代都是神职人员，其母亲更通晓巫术，而荣格本人自幼便有分裂性人格，他甚至为自己的不同人格分别命了名。在1914年，荣格辞掉职位，开始了一连串旅行，并对东方神秘主义产生兴趣，希望去探索自己的潜意识。这些，在他的同行看来，全部是癫狂的迷信行为，认为不登学术大雅之堂。

荣格沉寂了近七年的时间，直到他的《心理类型》和《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成为他在学术上的翻身仗，这两本书探讨了意识的无穷可能，也让荣格在心理学声名大噪。前一本书所提出的理论框架，直接成为今天风行的MBTI十六型人格测试的学术基础，而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后一本，跟中国古代文明息息相关的“金花的秘密”。

《金花的秘密》严格来说是荣格与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的合著，卫礼贤翻译并注释了中国的一本古代内丹经典《太乙金华宗旨》，全名为《吕祖先天一气太乙金华宗旨》，相传为唐代仙道吕洞宾所著，实际作者不详。荣格在此之前已有研究《易经》的基础，但他一开始以为《太乙金华宗旨》只是一部跟瑜伽和炼丹术有关的文献，并没有给予重视，随着深入的研究，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东方古书，在中古时代的智慧中，人们可以找到灵知与当代人集体无意识之间的联系。《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便是对《太乙金华宗旨》的深度解读和阐述。

“金华”即“金花”，其实就是带有金色光芒的曼陀罗，许多禅修者声称，在冥想禅定的时候，他们能够见到曼陀罗图景，这种图像似从日轮演化而来，在许多古代文明的图示中都有相似的图腾，在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中，曼陀罗更是普遍借用的符号，“金花”也因此具备了视觉、宗教和哲学上的象征意义。

在荣格看来，西方精神的根基立足于科学的发展与功绩，但人类应该把科学作为自己的宝贵工具，而不是所追求的目的。“科学必须做臣仆，一旦篡夺王位就会做错事。……然而，正是东方把另一种更加广泛、深刻和高明的理解方式传授给了我们，那就是通过生命去理解。”但荣格反对西方人陷入东方的迷狂只是原样照搬一些瑜伽功夫，成为可怜的形式模式者，他更希望用意识层面去深刻理解“金花的秘密”，一种存在于生命更高维度的秘密。

说实话，相比起弗洛伊德来说，荣格是难以阅读的，他那晦涩、拗口、充满意象的长句子，常常令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阅读荣格同样有一种艰难的乐趣，一种类似寻找宝藏和解码的乐趣，如果你能用悟性与想象力，去勾连他笔下的跳跃之处，填补他字里行间的未尽之意，用意识抵达意识，你就能最大程度地接近这枚不按牌理出牌的复杂大脑。

善恶之间

□ 陆远

半个月前去世的斯坦福大学荣誉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是受中国读者喜爱的当代美国心理学家，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个90多岁的老头凭借渊博的知识、风趣的语言和睿智的应答，在B站上收获了五六十万中国粉丝。在20世纪心理学史上，津巴多无疑也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因为他曾出任过美国心理学会会长，撰写过影响巨大的心理学教材，更重要的是，他在半个多世纪前主持的那场“斯坦福监狱实验”，尽管持续了不到6天就中途夭折，却成为现代心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案例。津巴多由此提出的“路西法效应”这一概念，直到今天仍在深刻影响我们对社会环境与人性善恶的诸多思考。

回到1971年8月，那6天里，斯坦福大学乔丹楼的地下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一年，38岁的津巴多博士正处在春风得意的事业上升期，他主编的《心理学与生活》在出版后的大获成功，不仅为这位年轻的学者赢得广泛学术声誉，也改善了他的生活水平，他渴望开辟更具影响力的心理学研究领域。在嬉皮士、环保、反战等运动风起云涌的社会氛围中，津巴多找到了方向：行动中的社会心理学。他为此设计了一项实验：模拟监狱中的人际动力学。

8月15日，实验开始了。24名大学生被带进斯坦福大学乔丹楼地下室一座被临时改造出来的逼真的“模拟监狱”，他们都是自愿报名参加实验的志愿者，每个人都遵守守法、身心健康、情绪稳定。大学生被随机分配了角色：9人扮演“囚犯”，9人扮演“狱警”——他们的任务是“维护监狱的秩序”，剩下的6人候补。直到此时，包括津巴多在內，所有人都觉得这不过是一次寻常的行为实验，大学生们会“表演”他们的角色，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就像在学校晚会的舞台上一样。

然而，实验正式启动仅仅几个小时后，骇人听闻的场景出现了。凌晨两点半，“狱警”们吹响哨子叫醒熟睡的“囚犯”，让他们排队接受体罚。翌日清晨，受不了折磨的“囚犯”们奋起反抗，堵住牢房大门，阻止“狱警”们进入。换来的当然是更严厉的惩罚和羞辱：他们被脱光衣服、没收寝具、禁食，被迫用手洗马桶，带头反抗的人被关了好几个小时的禁闭……角色双方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囚犯”的情绪开始失控，有人开始绝食。

原计划为期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在第6天紧急宣告终止，所有档案被封存。很多年后重新启封的原始记录写道：“我们目睹了一群正常、健康的美国大学生被赋予了两种不同的实验职能，作为‘狱警’的一方，他们似乎通过侮辱、恐吓和剥夺同伴(被选为‘囚犯’的一方)的基本权利来获得快乐。最具戏剧性和令人恐惧的是，那些原本没有虐待倾向的人，轻易就激发了自己的攻击行为。”一位“囚犯”说：“我发现人类很容易不把同类当人看待。”

这项实验在当时引发的巨大反响令津巴多本人也始料未及，称之为“恶名昭著”也不为过，直到30多年以后，他才有勇气重新翻看当年的实验记录，并于2007年撰写了这本《路西法效应》首度详细披露“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台前幕后，并结合从该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彻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

路西法是西方宗教神话中上帝最钟爱的天使，最后却堕落到地狱成为恶魔。津巴多以“路西法”为书名，是想通过对心理学实验的解读，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让人为恶？

作为严肃的心理与行为科学家，津巴多不会认同宗教层面简单的善恶二分法，也不会满足于“先天不良后天失调”之类简单的生理归因。在系统梳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各种数据、文字与影像资料的基础上，结合20世纪后人类历史上那些反人类的极端暴力事件，津巴多得出结论，特定的场合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外部情境压力，以我们想象不到的力量迫使人改变性格，促发去个性化、服从权威、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津巴多称之为“去人性化”过程，它好比心理上的白内障，遮蔽人们的理性思考和怜悯心，让任何普通人变得冷漠无情，甚至肆无忌惮地犯罪。津巴多说，想要全面和完整地解人类行为，特别是那些极端的、反常的行为，就必须正视和深入研究社会情境对人的巨大影响，而这也是改善人际关系、创造健康社会的前提。

令人欣慰的是，这场探索阴暗心灵的旅程在最后一章迎来光明的结尾。津巴多告诉我们，人性终究是良善的。社会科学可以帮助人们通过种种方法，利用个体力量挑战情境的力量。

书籍界的哥伦布

□ 李北园

2024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与苏州校区联合举办了“文明的曙光：世界各地书籍的形成及其早期历程”国际学术会议，探讨古代中国、埃及、希腊、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等十个文明中书籍的形成史。

“第一本书”出现于何时？很难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因为从口头讲诵、文本实践到物质对象的书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就像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剑澜在开场致辞中提到的那样：书的出现是文明的曙光，书的存在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缘由和证明，它意味着人类可以将知识和思想有效地传递给下一代。

相比于书本身，出版人是隐身者。当读者在翻阅书籍时，通常只会对书的内容或者作者感兴趣。但在新近出版的《书籍是怎样炼成的：现代出版之父的传奇一生》一书中，15世纪的隐身者阿尔多·马努齐奥被推到了前台，他是书里的主角。

大约1450年，阿尔多·马努齐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地区的巴夏诺镇，20多年后，这位小镇青年前往罗马学习，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并钟情于语法研究、经典阅读等高雅活动。1480年，阿尔多成为意大利中部城市卡尔皮领主的宫廷教师，成功进入上流社会。

与阿尔多的成长经历同步的是，德国人约翰·古腾堡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1465年被引进意大利，活字印刷导致了欧洲的出版和媒体革命，迅速推动了科学和社会的发展。文化氛围浓郁的威尼斯，很快地后来居上，成为全意大利甚至整个欧洲最活跃的印刷中心。此时，正值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渴望从古希腊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但旧式书籍的排版和装帧设计显然造成了不小的阅读障碍。

如果回到那个时代，我们看到的书是什么样子，《书籍是怎样炼成的：现代出版之父的传奇一生》中这样描写：“在当时的一部著作中，人们会将从古至今全部的评注组合在一起出版，而印刷商总是尽可能提供至少三到四种评注，将这些评注交替排在对开格式大尺寸图书(对开纸即全开纸对折一次后得到的纸张，用此类型纸制作的书的尺寸至少为40厘米×26厘米)的空白处。”

这样的书，显然对普通读者很不友好。阿尔多是时候出现了。大约在1490年，40岁的阿尔多来到威尼斯。很快，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拉丁语版的《缪斯之歌》，这是一本典型的教辅书，相比于当时流行的大开本书，它显得十分迷你，是一本便于翻阅的小册子。之后，阿尔多又出版了几本教辅书，并逐渐从作者转变为出版人，拥有了自己的印刷厂。

阿尔多作为出版人的首秀发生在1495年2月，他推出了希腊语语法：康斯坦丁·拉斯卡里斯的《问答》，在该书序言里，阿尔多表达了他作为出版人所肩负的使命：“在这个充满苦难的泪谷里”“我们决定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人性的光荣”。听上去冠冕堂皇的说辞，绝非仅仅是一位出版商为自己贴金。纵观阿尔多的出版生涯，他所所在的亚平宁半岛始终处于极度动荡之中。战争的危机，时刻牵动着阿尔多的神经。面对外国军队的到来，民族主义盛行，人们希冀自由传播的思想和知识可以构成对入侵者的一道防线。

阿尔多是那个巩固防线的人。他彻底终结了用评论和解释来框定文本的风气，使得本该成为书籍核心内容的文本得以完整地出版，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地理解所读到的内容。阿尔多重新采用八开本形式出版经典著作，让图书拥有了索引和书封；此外，他还发明了意大利斜体，与人合作创造了新的字体，并在书籍装帧方面应用了多项创新技术和设计，他还与孙子一起创建了标准化的标点符号系统。

在阿尔多的努力下，现代图书的范本形成了。毋庸置疑，没有阿尔多，就没有现代的出版业。

而对于阿尔多来说，书成为他接触包括宫廷贵族在内的社会各阶层的重要通道。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就是阿尔多的读者之一。这位地理大发现先驱者，每到一处都喜欢买点纪念品，阿尔多的出版物是他中意的纪念品之一。他至少拥有26本阿尔多出版的书，每一本书上都一丝不苟地注明购买日期、地点和价格。

哥伦布对知识海洋同样有兴趣，而阿尔多，则是那个为出版界别开生面的探险家。经阿尔多改良形成并在后来不断完善的现代出版范本，大约19世纪上半叶进入中国，并很快得到应用推广。至于这种外来出版范本与中国本土出版物之间的彼此借鉴融合，又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远见近拾